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参考系列 76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五十年战争

世界政治中的美国与苏联

(1941~1991)

The Fifty Years War: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in World Politics, 1941-1991

[英] 理查德·克罗卡特 著

(Richard Crockatt)

王振西 钱俊德 译

王振西 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参考系列

五十年战争

世界政治中的美国与苏联

(1941~1991)

The Fifty Years War: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in World Politics, 1941-1991

[英] 理查德·克罗卡特 著

(Richard Crockatt)

王振西 钱俊德 译

王振西 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五十年战争：世界政治中的美国与苏联：1941～1991/
(英)克罗卡特(Crockatt, R.)著；王振西，钱俊德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10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参考系列)
ISBN 978-7-5097-7846-3

I. ①五… II. ①克… ②王… ③钱… III. ①冷战—国际
关系史—研究 ②美苏关系—研究 IV. ①D8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67135号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参考系列 76

五十年战争：世界政治中的美国与苏联(1941～1991)

著 者 / [英]理查德·克罗卡特
译 者 / 王振西 钱俊德
校 者 / 王振西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祝得彬
责任编辑 / 张苏琴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全球与地区问题出版中心(010)59367004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31.75 字 数：445千字

版 次 / 2015年10月第1版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7846-3

著作权合同 / 图字01-2015-5551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98.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 ·

本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编

Copyright© 1995 Richard Crockatt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Routledge, part of Taylor & Francis Group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原版由 Taylor & Francis 出版集团旗下 Routledge 出版公司出版，并经其授权翻译出版，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is authorized to publish and distribute exclusively the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language edition. This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throughout Mainland of China. No part of the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本书中文简体翻译版授权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独家出版并限在中国大陆地区销售。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发行本书的任何部分。

Copies of this book sold without a Taylor & Francis sticker on the cover are unauthorized and illegal.

本书封面贴有 Taylor & Francis 公司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序 言

牛 军*

《五十年战争：世界政治中的美国与苏联（1941～1991）》（以下简称《五十年战争》）是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克罗卡特（Richard Crockatt）教授的名著。这部著作出版于1994年，后来由王振西和钱俊德先生翻译成中文出版，目前这个版本已是中文的第二版了。我很荣幸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邀请为新版写序，这对我也是一次再读国际冷战历史的机会，当然也是一种督促。

和所有的读者一样，我最初获知《五十年战争》要出新的中文版时，立即会问这是为什么。我认为首先是社会中有巨大的需求，即越来越多的人希望确切地了解二战后持续了四十年的冷战的真实历史，包括冷战是如何发生的，以及它到底给世界带来了什么影响。

“冷战”这个词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由美苏两国对抗导致的国际体系的概括，这个“体系”一直延续到1991年，以苏联阵营崩溃和苏联解体而告结束。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于1945年提出这个概念，尔后被美国政论家们当作专有名词广泛传播。奥威尔最初试图强调的是美苏对抗已很激烈，只是没有发生战争。不过随着美苏对抗的特殊状态的固定化，这个词中的

* 牛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冷”变得更重要了。因为美苏都认为自己在进行殊死搏斗，同时却一直维持着和平的状态。后来的发展证明，“冷战”非常准确地概括了那个新时代的本质特征，其影响之久远，即使在当今的诸多国际纷争中，涉入其中的各方通常还会用“冷战”“冷战思维”等互相指责，尽管多数人未必确切知道冷战的诸多特征。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话语的延续在深层次上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影响，世界仍然没有完全走出冷战的阴影。

对于中国读者，还有一层更迫切的需要，即对当下中美关系及其未来走向的特殊关注和担心。自1979年中美建交，三十五年来两国关系获得前所未有的迅速和大规模发展，但双方目前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困难，甚至被认为处于建交以来“最不好的状态”。一些所谓的“战略家”们如此经常和随意地使用诸如“遏制”“渗透”“核战略威慑”等冷战词语来界定中美两国的对外政策和战略选项。毫无疑问，这些话语未必能反映我们今天面对的事务的复杂性和新特点，但它们的确会导致人们越来越怀疑，中美是否正在滑向一场类似冷战的新的大国对抗。

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经指出，大量研究都能证明，每当面临历史关头，人总是根据自己认识的世界而非真实的世界做出选择。20世纪著名的学术理论家卡尔·波普尔（Sir Karl Raimund Popper）对历史研究价值的论述指出了人类认知的这一特点。他说：“不可能有‘事实如此’这样的历史，只能有对历史的各种解释，而且没有一种解释是最终的，每一代人都有权形成自己的解释。他们不仅仅有权形成自己的解释，而且有义务这样做，因为的确有一种寻求答案的紧迫需要。”国际冷战历史就属于有“紧迫需要”寻求新解释的领域，它满足了成为历史研究者必须予以关注的两个基本条件，同时这也是促使读者发生兴趣的两个基本驱动力。其一是它的特殊重要性足以勾起人们的好奇心，使人们非常希望知道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并造成了什么后果。其二是它同今天的诸多事态有密切关联，人们渴望尽可能地搞清楚它对当今世界包括自己生活的影响及其达到了何种程度。

上述情况可以被中国图书界大量翻译介绍有关冷战的论著和国际

冷战史研究在中国方兴未艾的趋势所证明，从这股热潮中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中国的研究者和读者对国际冷战历史日益增长的兴趣。尤其是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冷战研究名著被翻译介绍到中国，包括最负盛名的著作，如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 Gaddis）的《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长和平：冷战史考察》；梅尔文·P. 莱弗勒（Melvyn P. Leffler）的《人心之争：美国、苏联与冷战》；文安立（Odd Arne Westad）的《全球冷战：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与当代世界的形成》；梅尔文·P. 莱弗勒和文安立主编的三卷本《剑桥冷战史》；弗拉基斯拉夫·祖博克（Vladislav M. Zubok）的《失败的帝国：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等等。还有很多从不同角度、针对不同专题、涉及美苏之外诸多国家的论著，在此不一一列出。这些译著同许多中国学者的论著一样，都已经成为中国的国际关系史、冷战史和世界史领域教学及研究的必读书。由此自然会产生一个问题：理查德·克罗卡特教授1994年出版的《五十年战争》这本书的特点是什么？重读这部著作会给读者带来哪些教益和启发呢？

我曾经就上述问题与在美国哈佛大学任教的文安立教授讨论过，他非常热情和肯定地介绍了《五十年战争》的学术价值和独到之处，我读过后有同感。我本人最深的印象概括地说，就是从中发现了后来国际冷战史研究发展的诸多重要线索。仅此一点，就有理由将该书收入了解国际冷战史的重要图书之列，何况它还展示了作者强大的叙事能力和宽阔的视野，以及不少堪称睿智的分析和判断，尤其对历史研究者是很有启发的。

与作者写作的时代（1989～1994）相比，国际冷战史研究最突出的进展，也是引起世人关注的最重要原因，是大量历史档案的发现、收集和整理，并为读者展示了太多闻所未闻的历史故事。它们结合在一起，组成了一幅丰富繁杂、波澜壮阔的难以想象的历史画面。从国家间的冲突与战争，到生态环境、公共卫生和移民潮等，无不被打上冷战的烙印。诚如这本书的作者在二十年前出版《五十年战争》时所做出的论断：冷战是那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其他因素无法与之

相比的国际体系。

作者在全书的开始即坦承，他“主要依靠的是第二手资料”，也“参考了不少政府出版物、文件汇集、杂志、报纸和回忆录”，以及许多学者的论著。换句话说，发现和利用新发掘的历史档案不是这本书的特点，也不是目的，当然当时的条件也难以同今天相比。这本书最突出的特点也是最富有启发性的特点是“从全球角度论述1941~1991年期间美苏关系史”，以及“论述美国和苏联得以适应或者未能适应全球变化的原因”。

《五十年战争》分五个部分，加上结束语共十四章，涵盖了国际冷战史的大部分主要问题，可以说是一部对国际冷战历史全景式的叙事。作者在序言中清楚地告诉读者自己写作的初衷和论述的两个主题。他首先强调了冷战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互动的产物，“必须把美苏关系看作一个互动的过程，而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行动过程”。这一判断对中国读者尤为重要。国际冷战史研究首先是也主要是在欧美学者尤其是美国学者中展开的，有关冷战的缘起及其整个过程的研究一直存在尖锐的争论，那时中国甚至都很少使用冷战这个概念，所以对有关研究所知甚少，人们通常是从反映官方观点的报刊宣传中了解有关事件，故对冷战进程复杂性的了解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很有必要从不断更新的历史研究成果中获取必要的知识。

在美国，第一代研究冷战的历史学家通常都将冷战的发生归咎于苏联，而美国的战略则是对苏联挑战的回应。这批学者被称为“正统派”。越南战争之后，美国新一代历史学家提出了相反的论断，他们被称为“修正派”。这派学者倾向于认为，苏联的政策更具有防御性，反而是美国的误判和扩张导致了冷战对抗。随着1980年代所谓“新冷战”的出现和苏联在第三世界咄咄逼人的扩张，有关谁对冷战负主要责任的争论再度激化，美苏双方的政策都被置于学界更加严苛的审视之下。值得深思的是，不论是在冷战阶段，还是在此之前，苏联学术界（如果有的话）都在相关的学术领域中缺席，他们的集体“失语”导致现在的研究者没有可以借助的来自当年苏联及其阵营的

研究成果，因而，重建作为冷战一方的苏联的历史，成了冷战后国际学术共同体的艰巨任务。

在冷战的年代，对于所有参与研究的历史学家来说，最大的难题是完全无法获得苏联及其阵营方面的档案资料。这种情况在冷战后一个时期有了非常大的改变，俄罗斯保存的大量苏联时期的档案和东欧国家的档案被挖掘和整理出来，历史学家们终于得以在来自“铁幕”两边档案的比较基础上，重新构建国际冷战历史的叙事。这些新的叙事有非常丰富的内涵，对于这本书来说，特别重要的是新的研究成果为冷战是“美苏互动的产物和过程”这一观点提供了强有力的论证，尽管它并非无可置疑。人们既不能简单地确认是美国发动了冷战，也不能简单地断定是苏联挑起了冷战。在整个冷战发生、演变的过程中，美苏的确存在对抗性的战略利益冲突，但并不能因此否认诸多它们难以掌控的重大事件（如1971年的印巴战争等）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还有些重大事件则是由双方的战略误判造成的。诸多研究成果告诉读者，仅通过意识形态的透镜观察和解读像冷战这样复杂的历史过程，是非常不可取的，那样不仅会导致对世界政治的极为狭隘的理解，而且有可能导致悲剧性的战略错误。

第二个特点是从《五十年战争》中，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深刻影响。作者很明确地指出，他力图将整个叙事置于根据国际政治体系理论搭建的框架之中，将美苏对抗视为二战后国际体系导致的结构性对抗的结果。二战的结果之一是结束了多极体系，欧洲的衰落导致出现两个超级大国对抗的两极体系。作者认为，在所有影响世界政治进程的各种因素中，美苏对抗的冷战体系是压倒性的，严重影响了世界政治的各个方面和世界的各个地区。

作者从美苏对抗的历史根源开始叙述，将两国对外政策的历史传统作为分析体系性对抗的起点，叙述了在全球变迁的过程中，冷战是如何爆发的，“缓和”是如何出现的，又是什么导致了两个超级大国再度紧张对抗的“新冷战”，以及冷战最终因苏联解体而和平终结的过程。在宏大而有序的叙述中，作者显然试图在体系理论的导引之

下，揭示冷战体系的内在机理，包括美苏两国的国内政治结构和重要人物的作用，例如在第四章对美国和苏联两国国内体制的特征和领袖的素描式分析。要在一部历史著作中完成这样的任务并非易事，作者的尝试很有价值，尤其是还能使全书读起来相当引人入胜。

《五十年战争》试图“从全球角度”审视冷战体系，实际上不可避免地会将国际冷战置于全球进程的更大的背景之下。由此就有必要充分和系统地阐述冷战时代发生的、在冷战体系之外的、属于全球视野的各种事务，包括地区问题、第三世界、跨国因素、非政府行为体等的发展，与冷战体系之间的相互影响。如果将冷战体系置于影响全球进程的中心地位，就有必要进一步分析和探讨其他方面的重要性和意义，例如第三世界的影响。毕竟这个概念涉及幅员辽阔、国家和人口数量巨大，并且被证明影响力不断提升的重要地区。2010年出版的文安立的名著《全球冷战：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与当代世界的形成》在这方面是有开拓性的，他的研究证明，冷战时代第三世界中的各种力量和行为体的实际影响，比之前人们所了解的要大得多。显然，从全球进程中研究美苏互动这个命题，理应展示更为丰富的内容，以及产生更为深刻的见解。《五十年战争》能早在二十年前提出这方面的问题并做出独到的努力，是非常有意义的；读这本书对理解国际冷战史研究的进程也有特殊的价值。

《五十年战争》的确有很多值得推荐的内容，它会引起读者认真阅读和深刻思考。书中的叙事固然很有吸引力，很多素描式的论述会使读者比较容易地了解重点并留下印象，更重要的是书中的很多分析和判断会刺激读者不断诘问和思考。实际上作者在叙述冷战过程时，一直在不断地提问，也没立即做出回答，从而给读者留下很大的想象空间。总而言之，这本书对感兴趣的读者必定是开卷有益的，由此也证明了译者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见地，他们为这本书的再版所做的努力是非常有意义的。

2015年7月于北京

本书献给

克拉拉、山姆、玛萨和约翰

前言与致谢

本书是从全球角度论述 1941 ~ 1991 年期间美苏关系史的新作。它既不是简单地论述两个超级大国的双边关系，也不是一部全面的世界史。其主题是论述美国和苏联得以适应或者未能适应全球变化的原因。

作者于 1989 年秋开笔，于 1994 年 1 月完成全书。毫无疑问，这些年间世界的风云变幻必然会在本书的各个阶段有所体现。朋友们问我是如何与事件保持同步的，我的答复像往常一样：共产主义的崩溃与冷战的终结与其说使我的任务更加困难，不如说更有利于打造本书的主题框架，我们终于可以用超脱的态度来评说战后年代了。冷战现在真的成了历史。

要通览许多学者和记者对冷战及其终结的评论文章是不可能的。这方面的书刊很多，而且还在迅速增多，任何人也不可能全部通读它们。我按照自己的希望做到了审慎地选择适用的材料。我在此书中不时地中断一些问题的叙述，以便讨论学者们对事件的解释有争议的文章，或者那些新的理解明显会改变对重大事件看法的文章。前一方面的例子是关于冷战根源的争论，后一方面的例子是古巴导弹危机。

尽管我主要依靠的是第二手资料，但也参考了不少政府出版物、文件汇集、杂志、报纸和回忆录。众多学者和记者就本书所谈问题曾发表过不少文章，在这里要特别感谢其中的两位：约翰·刘易斯·加迪斯和雷蒙德·加特霍夫。他们的文章实际上在每个关键问题上都使研究冷战的学者颇受启发。对研究冷战的历史学家来说，最有价值的

资料来源是华盛顿特区伍德罗·威尔逊国际研究中心的冷战国际史研究处。该处出版的工作文件和简报，通报了新近公开的苏联和东欧文献中的新发现。

我自始至终遵循了这样一条原则，即必须把浩繁复杂的事件归纳出一个头绪。首先想到两个重点。第一，必须把美苏关系看作一个互动的过程，而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行动过程。关于冷战时期美国政策的论著很多，关于苏联政策的论著却比较少，而力图同时论及两个超级大国政策的论著就更少。当然，关于苏联政策的资料相对来说比较少，关于美国政策的资料很丰富，也是造成这种不平衡的一个原因。即使现在，尽管关于苏联的新资料几乎每天都有，可是这种不平衡依然存在。尽管有许多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已经被揭露出来，但是要挖掘对美国有用的（假设它们存在的话）大量苏联资料仍需要若干年的时间。要对它们进行编纂需要的时间就更长。因此关于苏联政策的许多结论必然还是暂时的。

然而，这一缺陷不应当被用来当作对苏联政策——无论是其本身的政策，还是与美国关系方面的政策——研究不够的理由。苏联的行为是明摆着的，只是对它们的解释存在不同看法。对美国政策的解释同样存在巨大的分歧，尽管有丰富的资料。或者说，出现分歧的部分原因也许正是因为资料太丰富。这并不是说我们对苏联的决策过程知道得相对不多情有可原，也不是说第一手资料不重要，而是说，对历史事实的理解不能只根据资料。同样重要的是要做出一种判断，即人们会怎样理解和看待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博学广识的社会学家说：“你站在什么地方，你就从什么角度看问题。”在很多情况下，历史学家尽管身不在华盛顿或莫斯科，倒也能够设身处地地去看问题。在本书中，我把自己置于这两个极端之间。我出生的时间和历史发生的时间使我更容易做到这一点，能够比1989年以前的历史学家更客观地看问题。

我的第二个重点是把历史学家和国际关系理论家的观点结合起来。在很大程度上讲，这两派观点是沿着不同的方向发展的，提出的

问题不同，使用的语言也不同。历史学家对理论家使用系统分析的方法表示怀疑，认为他们的方法是人为地把复杂纷繁的事实简单化。而理论家则对史学家苦心研究现象性的东西是否有意义提出质疑。理论家起码要问问史学家，他们的研究到底有多大价值，是否能够揭示国家之间的关系、战争的起源以及和平的条件等。

实际上，可以说这两种方法都吸收了彼此的做法。如果历史研究不把观点条理化，或者得出的结论与人们始终关注的哲学或社会问题毫不相干，那么这就不算是历史研究或者说不算是正确的历史研究。同样道理，如果理论家抽象出来的结论没有详细的史实做依据，不对现象性的东西进行研究，那么也毫无价值。这一点的确千真万确。但在很大程度上，史学家和理论家之间仍有分歧。这可能是因为史学家认为理论家无法对历史的变革做出解释，而理论家则认为史学家忽视了制定外交政策的结构性因素。冷战的终结无疑有助于缩小这种人为的分歧。看似稳定的国际结构突然之间解体了。这使我们能把关注的焦点准确地置于国际政治中变革与结构的关系上。

当然，本书没有在这方面对国际关系理论做出贡献，但它运用了一些理论方法，相信这些方法能为理解历史问题提供指南。具体说，这种从世界格局的角度考察问题的方法，有助于阐明美苏进行争夺的全球背景。如果跳出人们通常采用的只分析单个国家或美苏双边关系的方法，那么，对于冷战起源等方面的重要问题就能得出新的观点。第一章、第四章第一节以及第十四章阐明了这些问题，并提出了贯穿本书的主要观点。为了阐明某些具体历史问题，我还在许多地方采用了其他的理论，如决策理论、“复杂相互依存”理论等。

我按上述方法打破史学家与理论家的界限，肯定会使二者都感到失望。但应该说明的是，我选用何种理论方法的标准是看它是否有助于理解历史的变革。

本书一至五章中对我的《美国与冷战，1941～1953》一书（1989年由英国的美国研究协会出版）做了重大修改与补充。本书十四章中使用了我的《稳定理论与冷战的终结》一文中的某些资料。

该文被收入迈克·鲍克尔和罗普·布朗合编的《从冷战到苏联瓦解：1980年代的理论与世界政治》一书，由剑桥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我对上述两个出版单位表示衷心感谢。

在撰写本书过程中，我得到一些研究机构、朋友和同事的大力相助。东英吉利大学允许我休一个学期的学术研究假来撰写本书，而且多年来给我创造了发挥我对历史和政治科学兴趣的条件。我非常感谢后来几年的大学生选修我研究的冷战专题。感谢国际关系研究生班的大学生。我感谢宾夕法尼亚卡里斯尔市迪金森学院在1992～1993学年给我提供了非常合适的教学与写作环境，同时感谢富尔布雷特委员会向我提供赞助，使我得以在卡里斯尔待下去。

在知识方面给我最大帮助的是斯蒂夫·史密斯先生，他原在东英吉利大学任教，现在威尔士大学任教。在和他一起工作期间，我学到了很多，我们曾合作写过一本书，并曾一同在东英吉利大学攻读国际关系硕士学位。他仔细阅读了本书的大部分章节，并回答了我提出的许多问题。他是最要好的朋友和同事。多亏他，我才得以涉足国际关系领域。

其他朋友也为本书花费了不少时间，并提出了不少建议。爱德华·阿克顿看了第二章，拉塞尔·博瓦看了第十三章，而迈克·鲍克则看了本书的大部分原稿。他们都是研究苏联/俄罗斯的专家，由于我学的是美国问题研究，因此发现他们的详细意见对我特别有用。鲁斯马利·福特和安德鲁·帕特莫尔都是研究超级大国在亚洲的政策专家，他们分别看了本书的第五章和第十章。道格拉斯·斯图尔特是军备竞赛和安全政策方面的专家，他认真看了第七章和第十一章。他和拉塞尔·博瓦在迪金森学院政治科学系工作，他们总是乐于听取我的不成熟的想法，使我顺利完成了后几章的写作。我还要感谢那些读过初稿的朋友，特别是理查德·阿尔德里奇，他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议。当然，上述任何人都不对最后结果负责，本书所有不完善之处完全由我个人负责。

鲁特利吉大学的戈登·史密斯是一位令人鼓舞和有耐心的编辑。

我高兴的是，许多年以前将我们从安温－海曼带向不同方向的命运和分久必合的机缘，又让我们在鲁特利吉走到了一起。

感谢斯特凡妮·哈里在文字加工方面的帮助。感谢格拉斯迪·卡什曼帮助我准备手稿，他从来都是兴致勃勃地出现在迪金森大学的历史系里。

有些朋友很少看或者根本没有看过此书稿，但他们很关心它，给了我不少精神鼓励。他们是约翰·阿什沃思、勒格斯、奥利·诺兰、利迪·帕克斯顿、罗杰·汤普森和鲍勃·温斯顿，我对他们表示衷心感谢。格雷姆·温常常让我在他的寓所里进行不受干扰的写作。在写作的最后阶段，与莱奥尼德·戈兹曼的交谈很有用。20多年前在苏塞克斯大学听迈克尔·邓恩的讲座使我受益匪浅，他在那里撒下的种子在第二章中开花结果。

克拉拉和我的三个孩子——山姆、玛萨和约翰——给了我极温暖的支持，没有这种支持这本书就写不出来。因此，愿将此书献给他们，以表我的爱心。

本书作者和出版商努力寻找并显示本书引用图表的版权所有。每幅图的来源均显示在图的下方。此外，我们在此还想向下列人员表示衷心感谢：图 0.1 的作者图米什·哈米尔顿和 W. W. 诺顿；图 2.2、8.2 和 10.1 的作者诺顿；图 0.2 的作者巴塞爾·布莱克威尔；图 2.1 和 3.1 的作者 D. C. 赫斯；图 4.1 的作者 A. 及 C. 布莱克；图 5.1 的作者哈珀·柯林斯；图 8.1、11.1 和 11.2 的作者麦克劳－希尔。图 0.1 欧洲（1939～1940）资料来源是 R. 埃德蒙兹著《三巨头》（纽约：诺顿出版社，1993）。此处未提到的版权所有，请与出版商联系。